

倪玉成家族与近代在福州西方基督教差会教育 (1847-1925)

何子建¹

(台湾福音书房 台湾省新北市 23842)

摘要: 近代三个西方差会(美国基督教公理宗海外传道部、美以美会、和圣公会)对倪玉成三代家族的教育有极大影响。倪家三代的教育史说明西方差会对当时中国基督徒所受之教育的影响。差会办学的出发点,本是为了在中国传教并培养自己宗派组织的教会和牧师群体。但与此同时,差会的教育兴办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中国基督徒领袖,倪柝声就是典型代表。虽然倪柝声受到良好的西式教育,因他勤读圣经,以至后来开始一个与西方基督教迥异的中国本土教会运动。

关键词: 基督教 差会教育 倪柝声 福州

Title:

The Nee Yucheng Family and Western Christian Missionary Education in Fuzhou (1847-1925)

Abstract:

Three Western missions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the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and the Anglica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were influential in the education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Nee family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he educational history of the Nee family demonstrates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missions on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s in that era. While the aim of these missions was to preach the gospel and to cultivate and produce Christian churches and ministers for their respective denominations, they also cultivated Chinese Christian leaders, of whom Watchman Nee was typical. Although Watchman Nee was prepared by his Western education, due to his diligent study of the Bible he began a Christian church movement in China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Western Christianity.

Key words: Christianity, Mission education, Watchman Nee, Fuzhou

¹ 邵薇女士对本文文字处理亦有一定贡献，在此表示致谢。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后，清政府于1842年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五个口岸对西方开放，各国商人、记者、外交官、探险家及传教士纷至沓来。美国基督教公理宗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 简称美部会或公理会)传教士于1847年来到福州，随之而来的是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和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²。1850年后三大差会都在福州建立了传教站，同时开始了各自的基督教教育事业，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倪玉成家族与三个差会在福州的教育事业为例，研究近代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影响。

一、 西学东渐：第一代华人信徒的信仰启蒙

福州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因其优越的临海地理优势，在清代中前期就是中国重要的海洋贸易区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处重要起点，《南京条约》签订后福州成为中国最早向西方国家开放通商的五个口岸之一。美部会差派的第一位传教士杨顺(Stephen Johnson 1803–1886)³于1847年1月到达福州，是抵福州最早的西方传教士。杨顺抵达福州后，认为此地是富有潜力的传教中心，于是写信建议美部会增派传教士。他在信中夸赞福州的山水，把闽江比作纽约的哈得逊河，称其美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对福州的喜爱。⁴传教士们到达福州后面临诸多包括健康在内的严峻困难，最首先的是寻找安身之处。那时的福州人对西方人接触极少，除了一点好奇之外，大多是敌意，不愿意把房子租给这些外国人。就算有人因为经济需要愿意出租，周遭四邻也加以反对，甚至地方官员也暗中阻拦，不想这些外国人在自己地盘惹出麻烦。1850年前后到达的第一批27位传教士，因健康问题导致有人辞职回国、有几位因为缺乏医疗条件而病逝福州，到1853年只剩下15位。⁵

传教士们大多受过很好的教育，学官话及福州方言是抵达后的第一要务，⁶然后开始借助办学传教。他们雇请有点学识的当地人做中文老师，努力学习中文和福州话，以便可以用中文直接向本地人传福音。一旦找到住地安顿下来，传教士就利用住房，或作学校、

² Dunch, Ryan.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2001, pp. 3-4.

³ Carlson, Ellsworth C.,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74, pp. 1-2

⁴ Carlson, Ellsworth C.,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2.

⁵ 同上，第11页。

⁶ 同上，第8页。

或作小教堂、或作诊所，以此接触中国人。到 1850 年时福州的这三个差会的传教士都在自己所在区域内开始办学。开始办的是运作简单的小型走读学校（Day Schools）。⁷ 这类学校通常雇用一个中国人作中文教师，由他们负责招募学生。当时学生的组成来源不一定也不固定，大多来自比较贫困的家庭，学习四到六年，学校提供一切衣食住行，如果成绩不好，学校可以辞退他；如果孩子的父母要让孩子退学，则要赔偿学校的住宿和衣物费用。学校还免费提供学生纸张、笔墨等学习用品，偶尔还会给成绩好的学生几毛钱作为奖励，有时候还提供免费餐。⁸ 学生的课程安排是半天跟着中国老师学习中文，教学模式就是中国式的：老师坐着读书，学生跟着重复，直到可以背诵。当然这些中国老师也不是基督徒。但西教士们着重的目的乃是传教，所以另外半天时间就是传教士教员们的专属课程：宗教和经文，再加上一些西方文化方面的知识。他们要求学生每周要背诵一定的新约经文，⁹ 加上教导主祷文、十诫、诗歌或圣经故事。

走读学校逐渐不能满足需要，约于 1854 年传教士开始办住读学校（Boarding Schools），开始只招男生，¹⁰ 年龄介于 12 到 18 岁。相对而言向住宿学校的学生传教比只上走读学校的更有成效，正如一位传教士写的：“（住在学校的）孩子们几年间都完全在我们的影响之下。”¹¹ 美部会早于 1847 年就在城外交通要道中洲开办义塾，据该会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52 年 1 月 5 日的统计，当时仅福州美部会传教团举办的义塾“一共有 4 所，义塾中有男生 54 名，女学生 33 名。学生总人数为 87 名。学校开支是 524.89 美元。传教团图书馆共有图书 216 册……校舍一共有 4 间。”¹² 2016 年笔者赴爱尔兰三一学院查询相关档案，找到英国圣公会 1899 年的一份会议记录，¹³ 可帮助我们了解早期传教士们如何训练华人传道人或牧师。根据这份记录，最早的教会学校，目的是训练男性华人为传教人员，以辅佐传教士在当地的工作。按照英国的教育标准，这些华人在走读学校、住读学校、书院或神学院不同级别的教会学校学习圣经，并在传播、讲解基督教经典方面受到严格训练。有志于传道的必须先完成所有课程，通过中英文考试，包

⁷ 同上，第 50 页。

⁸ 同上，第 51 页。

⁹ 同上，第 50 页。

¹⁰ 同上，第 52 页。

¹¹ 同上，第 53 页。

¹² 林健：“近代福州圣公会神学教育史初探”，在林金水等主编：《福建与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第 142 页。

¹³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Rules of Fuhkien Conference*, Fuchow Printing Press, March 1899, DUFEM 43

括听说读写，然后才会被差会雇用。他们第一年的工资为三块当时的币值。经过一年试用，他们还需要经过一年或更多的训练，训练期间必须遵守各种规定，只有一切条件符合的才会被雇成为传道人。住宿学校有别于走读学校，其目的不但让华人子弟成为基督徒，而且要培养基督徒工人，未来可以与西教士一起配搭在中国的传教事工，甚至可以独自到乡下发展工作。

通过兴办教育，传教士开始更加容易地接触到福州本地人士，并得到首批皈信的华人信徒。1856年，美部会在保福山为卢公明创立义塾所聘的教师施点水礼（见表一 Ting 先生），成为第一位华人信徒。次年该会又增加了四位华人信徒。然而，在周围的中国人并不十分友好的情况下，这些华人信徒并不稳固，如美部会早期信徒之一王炳臣后来离道，而圣公会的郑保灵、谢守廉则由于犯戒被革除出会（表一）。

表一. 近代福州基督教差会首批施洗信徒

差 会	首位信徒受洗时间	首位信徒姓名	首位信徒成分	施洗地点	施洗牧师(会长)姓名
美部会 (A. B. C. F. M.)	咸丰六年 (1856) 4月	Ting 先生	卢公明所创义塾之教师。	保福山寓所施点水礼	卢公明 (Justus Doolittle)
	咸丰七年 (1857) 10月	沈守真、倪玉成 (倪柝声之祖父)、刘孟湜、王炳臣	卢公明所创“福音精舍”之学生。	铺前顶救主堂施点水礼	
美以美会 (A. M. E. M.)	咸丰七年 (1857) 6月 14 日	陈安，字永高。以及妻子儿女 5 人	福州虎节路天泰染坊老板。时 47 岁，祖籍长乐。	天安堂施点水礼	麦利和 (Robert Samuel Maclay)
圣公会 (C. M. S.)	咸丰十一年 (1861) 3 月 31 日	林守谦、林九如		城内驿前桥下布道所施点水礼	密会长 (George Smith)
	咸丰十一年 (1861) 7 月 4 日	郑保灵、 谢守廉	郑保灵祖籍闽侯西边乡，务农。		

资料来源：林健：《近代福州圣公会神学教育事工的创始和发展》。

福建民风保守，信仰基督教的人很少，倪家第一代基督徒倪玉成生于 1840 年，或许是因为家境贫寒，来就读卢公明所办的教会学校。¹⁴ 虽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比较有

¹⁴ *The Chinese Recorder*, Shanghai, 1881, Vol. 12, p. 62.

关资料，倪玉成上美部会的学校时间应该在 1853 年左右，即至少他满 13 岁之后。倪玉成最初上的或许为四所走读学校之一，然后可能因为成绩好，得以继续进入住宿学校。美部会评价倪玉成等人“有学问，也有道德，实心信主受洗后，立志传道。除了王炳臣半途辞职外，这三个人忠心做主的工夫，不怕什么艰难，什么拦阻，愿意传主的十字架”。¹⁵ 倪玉成且是美部会按立的第一位华人牧师。¹⁶ 另根据唐日安（Ryan Dunch）的研究，美部会在福州开展很早，但发展最慢，¹⁷ 比较而言，他们更注重翻译福音文字材料和与福音有关的书籍。美部会在福州按立牧师是 1881 年，到 1891 年，总共按立六位牧师。¹⁸ 倪玉成为牧师的最早年份应是在 1881 年或之后，那时他至少已经 41 岁，且成家育有下一代。

鸦片战争后尽管基督教各教派相继入闽传教，改信基督教的人却很少，第一代教徒多是处于社会边缘下层民众。美部会希望帮助最初的华人信徒找到配偶以作模范，可惜本会没有这样的人才，不得不“异地借材，秦晋联婚”，求助于宁波、广东的“贤德学女”。¹⁹ 最后倪玉成娶了广东的女信徒，组成了基督教家庭，后来生下倪文修等九名子女。²⁰ 1890 年去世前，倪玉成在救主堂任传道达三十年之久，信徒 150 多位，显然对其家族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起到一定的作用。²¹ 或许缘于自身经历和时代趋势，倪玉成十分重视孩子们的中式启蒙教育，愿意他们循传统科举仕宦之途。

二、中西之间：第二代华人信徒的文化性格

美以美会是福州传教最为成功的差会，1848 年该会派传教士麦利和（Robert Samuel Maclay 1824–1907）到福州。²² 麦利和潜心学习研究福州话，他与摩嘉立（Caleb Cook Baldwin）合作编撰了《福州方言拼音字典》（1870）和《榕腔初学撮要》（1871）。²³ 美以美会在办学上起步晚于美部会，但无论办学规模还是水准方面都后来者居上。1891

¹⁵ 翁怀友：“福州公理会传道史”，《金陵神学志特号甲篇》，民国十三年秋，第 191 页。

¹⁶ *The Chinese Recorder*, Shanghai, 1881, Vol. 12, p. 62.

¹⁷ Dunch, Ryan.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2001, p. 17.

¹⁸ Dunch, Ryan.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2001, p. 18.

¹⁹ 翁怀友：“福州公理会传道史”，《金陵神学志特号甲篇》，民国十三年秋，第 192 页。

²⁰ 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下卷，中华福音神学院，1983，第 307 页。

²¹ 翁怀友：“福州公理会传道史”，《金陵神学志特号甲篇》，民国十三年秋，第 192 页。

²² Carlson, Ellsworth C.,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0

²³ *The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Foochow Dialect* (1870), *Manual of the Foochow Dialect* (1871)。参吴姗姗：《福州方言拼音字典》注音系统及声韵调系统研究，《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1 年第 6 期

年，美以美会已有 81 所学校，1271 名学生；该会所经营的各学校，都已经设有宗教、英文、算术、自然常识和劳作课程，“汉语课由塾师讲授，以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为教本，用福州话讲解”，教材“多采用美国的英文原版课本，由美籍教员任教”，²⁴ 同时期美部会所办的学校仅有 31 所，学生 452 人。1900 年，美以美会学校多达 275 所，学生 6296 人。²⁵ 经过传教士们四十多年的耕耘，小型教会学校遍及福州以及周围乡镇农村。中国人逐渐参与教会的管理，对教会的决策亦开始具有一定影响，他们要求扩大教学内容，传授英文和其它科学课，同时也呼吁提升教会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²⁶ 这种想法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对子女的期望，进入教会学校接受西式科学文化教育，以后西学中用以谋求官职和社会地位。这种背景下的教会学校势必做出一些调整，提高教学水准，不再只办初等学校，而转向中高等教育，既顾到传教需要，更为中国社会培养出基督徒社会精英，使基督教影响力不再局限于社会中下阶层。因此 1881 年美以美会创办了鹤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²⁷

英华书院是当时最有名的教会学校，分为八年制班级、以及四年制的书院班与英文班。校方希望学生不仅是基督徒，而且兼备中西文化，成为未来中国的领导和管理人才。为适应中国人的需求，扩大生源，1903 年的《鹤龄英华书院肄业章程并学舍规定》规定，学生通论文、诗释、五经一二方可入学，甚至声称“官话为中国通行之语，不容缺少。并特聘真正官音一师，将各班每日课一点钟，以便后来官场应酬”。²⁸ 由于科举根深蒂固的影响，为吸引学生入学，1887 年《闽省会报》刊登的《考问英华书院报单》称书院有学生 60 余人，多欲速成，又不愿舍弃科举之路，因此书院考试“首先为诗文”。²⁹ 缘此，“虽然这是一个教会学校，但教授儒家的经典，而且还得按中国的方式教，这样学生们才能在科举考试中与别人竞争”，³⁰ 并且所有学生几乎都未皈依基督。对于中国学生来

²⁴ 谢皆刚：《中西之间：第二代基督徒倪文修》，未刊稿，第 2 页。

²⁵ Dunch, Ryan.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2001, pp. 19-20

²⁶ Dunch, Ryan.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2001, p. 22, 39

²⁷ Dunch, Ryan.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2001, pp. 38-39

²⁸ 《八闽之光：福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志》，福州：福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出版社，2001 年；见谢皆刚：《中西之间：第二代基督徒倪文修》，未刊稿，第 2 页。

²⁹ 同上。

³⁰ 沈弘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2014 年，第 36 页；转引自谢皆刚：《中西之间：第二代基督徒倪文修》，未刊稿，第 2 页。

说，进入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最重要的原因是西学实用。在宗教、英文、算术、自然常识和劳作等课程外，“汉语课由塾师讲授，以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为教本，用福州话讲解”，又“参照美国高等学校模式进行了改革，分中文系（或书院班）和西文系（或英文班），教材“多采用美国的英文原版课本，由美籍教员任教，国文科则聘请中举文人和社会名士教授”。“学生英语水平高，有的不到毕业就可以入洋行、邮政、海关各部门就业，地位巩固，薪金优厚”。教会学校的学生虽然热衷学习西文，但亦不愿放弃中式教育与科举之途。这时候的学校不再象初期面对贫穷民众时采取一切免费的政策，而是收取一定或高昂的费用，吸引中上阶层家庭。³¹

书院教学尽管采用西式教育，目的是启蒙下层民众，普及智识传播宗教，然而在号称海滨邹鲁的福建省城福州，儒学极盛，人们尊崇孔孟之道，热衷科举仕进，有一门父子四进士、兄弟六科甲的美谈，备受艳羡。另一方面，在福建的教会学校特别是鹤龄英华书院与格致书院(Foochow College，美部会卢公明所创)，学生得以接受的是较为纯粹的美式教育，极易产生民主革命的新思想。早在 1880 年代，他们就组织了青年会等新式社团，学习新知识宣扬新思想。1905 年，为反对美国排斥华侨，中国以新式学堂的学生为主力掀起拒美运动，鹤龄英华书院与格致书院等教会学校的“学生闻讯后，群情激奋，进行罢课”。³² 总体而言，第二代基督徒在自小接受西教的同时，受时代及出身的限制，仍然难以摆脱固有观念与行事的影响，观念与行事介乎中西之间，是清季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的中国基督教徒。

1877 年，倪玉成第四个儿子倪文修（1877—1941 年）出生。倪玉成源于自身的经验与时代的大势，请名师为文修进行中式童蒙教育，走科举仕宦的道路，其后进入鹤龄英华书院接受西式教育。³³ 在此大势下，倪文修亦在接受西式教育的同时，参加科举考试，中学还没毕业，就通过福州府院试中秀才，获得出任官职的资格。福州府院试，有 1892、1895 年的考试，倪文修取得功名当在 1895 年，又因精通英语，得到了在海关供事的机会，

³¹ 沈弘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2014 年，第 36 页；转引自谢皆刚：《中西之间：第二代基督徒倪文修》，未刊稿，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第 2 页。

³² 同上，第 3 页。

³³ 关于倪文修入鹤龄英华书院的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书院章程规定，“生童年宜十三岁以上，身家清白，子弟爱善，通晓汉文，可者着一妥保，方准肄业”，而西人讲的是周岁，故应该为 1890 年。查鹤龄英华书院自 1890 年第一届毕业生以来的历届名单，并无倪文修的名字，故其就读的应该是八年班。参谢皆刚：《中西之间》，未刊打印稿，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

于 1896 年 3 月进入潮海关任职。³⁴ 海关是近代中国政府机构中非常特殊的一个机关，其虽然处于政府序列，但为洋员把控，工作语言亦为英语。华员在洋关多为下层工作人员，倪文修进入潮海关时职级为试用后班，月薪 35 海关两。1899 年，倪文修立业后成家，迎娶林和平为妻。其实，在 1895 年倪文修中秀才，取得功名后，倪家就为其张罗结亲。倪文修既非科举世家，又非凭借极高的才气骤然及第的寒门士子，其宗教家庭与教会学校的出身，以及任职洋关的复杂背景，成为正统士绅眼中的另类。缘此，倪文修在婚姻上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状态，数次提亲皆不了了之。林和平是在福州南台福利洋行任职的林姓富商养女，1886 年林父大病，其老板鹤龄英华书院大金主张鹤龄³⁵ 提议请牧师祈祷，其后，林和平进入福建晋江的毓英女塾（美以美会万为 Erastus Wentworth 所创）接受新式教育。1898 年，倪家在为倪文修提亲数次无果后，托媒到林家提亲。林母说服林父，要求林和平放弃学业，回福州定亲。1899 年 10 月 19 日，双方举行婚礼，随即与倪文修南下汕头定居。1906 年倪文修升职四段前班，工资增加到 50 海关两，同年又调高到 60 海关两，³⁶ 林和平在汕头靠父亲帮忙作抽纱生意，获利甚多。1908 年底，倪文修调任苏州海关，林和平放弃汕头的生意，举家搬迁。1909 年，倪文修的母亲因家中老少需要人看顾，要求其请假回闽。³⁷ 倪文修是个孝子，遂向税务司请假，举家迁回福州。回乡定居后，虽然科举已经停止，但倪文修仍请秀才为孩子启蒙，学习毛笔字、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至于西化的教育则有钢琴，以及在主日接受老师与母亲林和平的圣经教育。

1909 年黄乃裳被选为福建咨议局常驻议员，留居省城，黄乃裳与倪家交好，据说倪文修就是在他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1911 年 4 月 1 日，倪文修被福州将军朴寿委任为闽海关委员。闽海关委员是受福州将军委派督理海常关税务及鸦片厘金事务的代表，故 1908 年 3 月之前的闽海关委员、厦门关委员皆为满人出任，其后始有汉人被委任，倪文修即为清季四名汉人闽海关委员之一。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席卷南中国，倪文修积极参与，其夫人林和平亦迸发革命激情。光复后闽都督孙道仁为林和平向北京政

³⁴ 广东省档案馆藏《潮海关呈总税务司文》（全宗号 101），转引自谢皆刚：《中西之间：第二代基督徒倪文修》，未刊稿，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第 3-4 页。

³⁵ Dunch, Ryan.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2001, p. 22

³⁶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九：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华书局，1964 年。

³⁷ 倪林和平：《恩爱标本》，上海：真如出版社，第 7 页。

府申请到二等勋章。1911年10月15日，倪文修就任新政府福州和厦门海关委员，1914年5月4日离职。1941年4月21日日军攻占福州，倪文修避居香港，同年年底病逝。³⁸

以倪文修为例，我们纵观第二代基督徒一生的观念与行事，由于科举与西式教育兼习的出身与时代的中西、新旧杂糅，介乎中西之间，不能不说这是来自于所接受的教会学校教育的深切影响。尽管第二代华人信徒呈现出中西兼顾的文化性格，然而其底色仍旧是中国的，仍可见其爱国的拳拳赤子之心。这种基督教办学带来的中西杂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用性，却为第三代发展并突破了，在近代中国社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三、大破大立：第三代华人信徒的本色实践

20世纪以前，基督教学校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公立学校，但是随着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设立及科举制的废除，中国新式教育迅速发展，在学生数量上逐渐赶超基督教学校。1906年人数已经为基督教学校人数的3.4倍，到1915年，公立学校人数达到4,294,251人，是基督教学校人数的24倍。³⁹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对基督教办学的巨大压力。1907年在上海召开“中国基督教传教百周年会议”，传教士纷纷提出要将基督教教育集中，兴办更加优质的教育，以便与公立学校竞争。从此基督教学校便从传教转向以教育为主，且陆续增加英文教育课程时数、科学教育课程、甚至篮球、体操课。⁴⁰此举对后来培养出能读写说流利英文的倪家第三代倪柝声有决定性影响。

圣公会差会注重传教、发展教友、设立教会。1862年传教士胡约翰（John Richard Wolfe, 1832—1915）受遣到达福州，胡氏注重推动传教和办教会，但对办学缺乏兴趣。到1880年，圣公会的发展规模超过另外两个差会，已有113个传教点，信徒有3556人，传道人有93位。⁴¹1876年圣公会史革伯（Robert Warren Stewart）来到福建，史氏注重办学，开始有系统地规划圣公会在福建的教育工作。史革伯认为中国人尊重有学问的人，应该培养出有文化的中国教员去传道，收益会更大。在他看来，中国的福音工作最

³⁸ 谢皆刚：《中西之间：第二代基督徒倪文修》，未刊稿，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第4-5页。

³⁹ 章博：《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学的发展——以华中大学为中心的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40页。

⁴⁰ Gwynn, R.M., Norton, E.M., Simpson, B.W. Compiled for the Mission's Jubilee. *T.C.D. in China: a History of the Dublin University Fukien Mission 1885-1935*. Dublin: Hodges, Figgis & Co., Ltd., 1911, p. 61. Courtesy of Trinity College Library Catalog PB 285-662 [此书以下简称 T.C.D. in China]

⁴¹ Dunch, Ryan.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⁴¹ Dunch, Ryan.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2001, p.19

终还得中国人来做。⁴² 他开始在当时的福宁府—今天的闽东霞浦县，以及附近的乡村办走读学校，传教兼扫盲，十年之中这样的学校他建了 82 所；他的计画是从乡村小学选拔成绩优异的农村学生，送他们进福宁府的初中，最后送到福州的高中或神学院深造。⁴³ 这样培养出来的中国传教士在中国人中间非常有成效。“史荦伯计划”实施二十多年后，到 1905 年圣公会在福建东部、北部、闽侯、福清、莆田、仙游等地办有 200 多所学校，学生达 3192 人。⁴⁴ 原本对办学持保守态度的胡约翰也改口称：“我终于确信现在时机到了，不应再裹足不前，差会应当向这个省这个城市的年轻人传授英文教育。他们无论从何种渠道都可以学到，以基督教信仰为媒介总比从别的非信仰媒介好。我必须承认自己一向持怀疑态度，反对传教士把时间花在教英文或西方科学上面，但是事过境迁，我现在改变态度，大力提倡我自己曾经反对过的事。”⁴⁵

与此同时，原在欧洲的爱尔兰三一大学响应史荦伯的倡议，参与远东传教，于 1886 年成立远东传道会和福建传道会 (Far East Mission, Dublin University Fukien Mission, DUFM, or Anglican Foochow Mission)。1906 年远东传道会负责人贝嘉德 (Horace MacCartie Eyre Price) 到福州考察教育传道，决定把圣公会教育中心从福宁府迁到福州，安排万拨文 (W.S. Pakenham-Walsh) 负责。当时圣公会的走读学校非常零散，从山里各村各乡选出来的农村男孩集中到福宁的寄读学校。万拨文有在别的学校办学的经验，他看到中国的科举制废除 (1905 年宣布，1906 年实施)，新的科学记分制、现代教材、以及先进器材，开始融入庞大的国家教育体制，给传教工作提供了机遇。⁴⁶ 过去教会学校主要为训练教会工作人员、传道人或传教士，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环境需要。很多圣公会教会里的中国基督徒也请求差会开办英文教学，让自己的儿子可以有机会接受类似美以美会鹤龄书院那样的英文教育。⁴⁷ 抓住机遇的万拨文于 1907 在福州南部仓山区施埔，开始圣马可书院 (St. Mark's College) 的办学，后改名为汉英书院。该学校的目的是提供优异的英文教育，向所有愿意支付高昂学费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男孩开放，以期学校

⁴² T.C.D. in China, p. 16

⁴³ T.C.D. in China, pp. 17-19

⁴⁴ 刘玉苍：《文史资料选编基督教天主教篇》（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424-445 页。

⁴⁵ T.C.D. in China, p. 39

⁴⁶ T.C.D. in China, p. 42

⁴⁷ T.C.D. in China, p. 50

可以自给自足，不成为差会的负担。⁴⁸ 第一期学生只有 10 人，但随后声誉鹊起，很多人来登记注册，第二年扩大到 33 人，分四个班级，实行 8 年学制。⁴⁹ 到 1909 年，吸引了 150 人前来报名，却因学校规模太小只能录取 100 人。⁵⁰ 1909 年圣公会委任三一学院福建传道会 (DUFM) 具体负责管理圣马可书院，⁵¹ 由圣公会差会出资并派教员。⁵² 早一年之前 (1908) 圣公会差会已同意出资 5000 英镑，⁵³ 筹建福州三一书院新校舍，购入原俄国领事馆及其周围的四座洋房和周围田地作为园地，并将圣马可书院与之前创办的“广学书院”、“桥南两等小学校”合并迁入新址。1912 年正式定名为“福州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⁵⁴ 三所学校合并后“圣马可书院”改称“汉英书院” (Anglo-Chinese School)，教学英汉兼用，英文为主，八年制，分为四个不同程度的班级。学生大多是家境良好的非基督教子弟，可以付得起高学费，以期毕业后获得一份优渥的职业；“广学书院”改称“中学”，为初中部，教学以汉语为主，六年制附设师范科，加读一年，学生大多是来自农村从走读学校选拔而来的子弟，其目的是为教会培养教育和传道工作的人员；“桥南两等小学校”则保留原名，六年制，高小、初小各三年 (参表二)。⁵⁵

表二. 近代福州圣公会神学教育与普通教育机构一览表

学校名称	创办年份	创办者名字	地址	性质	学制	校内教堂	所属机构
陶淑女校 (C. M. S. Girls' School)	1863	密太太 (Mrs. George Smith)	初设于乌石山，后迁至仓山岭后鳌头峰。（今	初为乌石山女子义塾。民国为女子中学。		圣保罗堂	CMS

⁴⁸ T.C.D. in China, pp. 45-46

⁴⁹ 据 T.C.D. in China 的报告，1908 年汉英学校名册上有 75 名学生，因地方不足只好回绝了另外 100 名学生的申请 (p. 45)。

⁵⁰ 刘玉苍：《文史资料选编基督教天主教篇》（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424-445 页。

⁵¹ T.C.D. in China, p. 47

⁵² 教员不足使万拔文经常头痛。笔者获得一份万拔文在 1908 年 9 月 14 日的亲笔函，说明办学大有进展但是教员人手不足，恳请圣公会差会帮助。同年 12 月 22 日圣公会差会覆函，为无法支援人手深感歉意。见附件一、附件二。

⁵³ T.C.D. in China, p. 47。参附件三，圣公会差会通知三一学院福建传道会，谓圣公会董事会已同意资助在福建省的工作五千英镑，并列出使用范围：扩充汉英学院、中学、及小学的教堂、体育馆、及宿舍，修建西教士(单身与已婚者)和四位中国籍教员的住所，另外还有三百英镑是奉献给女子学校(应该是陶淑女中的)的经费之用。

⁵⁴ T.C.D. in China, p. 51。刘玉苍回忆认为该校名称之所以被称为三一学校，原因有三：其一、这个学校与都柏林大学福建布道会有直接关系，而负责该会的核心团体都是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的人；其二、学校有原来的三所学校合并为一；其三、“三一”这个词是基督教的一个基本教义，上帝的性质是“三位一体”，如此校名亦标明学校为基督教性质。参刘玉苍：《文史资料选编基督教天主教篇》（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424-445 页。

⁵⁵ T.C.D. in China, pp. 5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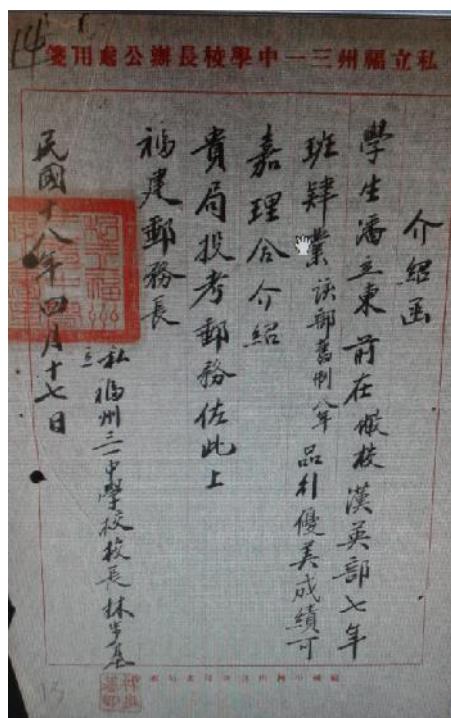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				
榕南圣教两等(初级、高级)小学	1863	胡约翰 (John Richard Wolfe)	初设于乌石山，后迁仓山公园路。(今福州外国语学校)	初名乌石山男子义塾，后发展为“内学”(Boarding School)	6年制，高小、初小各3年。		CMS
广学书院(Boy's School, Foochow)	1867	胡约翰 (John Richard Wolfe)	初设乌石山后迁仓山公园路。(今福州外国语学校)	男子中学	6年制，附设师范科，加读1年。		CMS
圣马可书院(St. Marks' College) 后改称“汉英学校”(Anglo-Chinese School)	1907	万拨文 (W.S. Pakenham-Walsh)	仓山公园路。(今福州外国语学校)	英汉大学预科	8年制		DUFM
福州三一学校 (Trinity College, Foochow)	1913	万拨文 (W.S. Pakenham-Walsh)	仓山公园路。(今福州外国语学校)	男子小学、中学、大学预科	初为8年制，1927年以后改6年制。	三一堂，为1927年以前福建教区代主教座堂。	DUFM
真学书院 (Theological College)	1877	史萃伯 (Robert Warren Stewart)	初设乌石山，后迁仓山蛇浦。	神学书院			CMS
寻珍女校 (Sing Ding Girls' School) 或(CEZMS Girls' School, Foochow)	1894	李师姑 (Miss Lee)	仓前山对湖路洋墓亭旁。(今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女子小学、中学			CEZMS
妇女学校 (Bible-Women's Training School)	1875	豪士顿师姑 (Miss Houston)	初设乌石山，后分设蛇浦、北门两处。	成年妇女圣经学校	2年制		CMS

汉英学校由英国、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传教士当任教师，尤重英文教育，一至四年级用英语学习的科目有会话、作句、作文、默写、拼音切字、翻译、读本、文学等；五至八年级不论几何、代数、三角、天文、生理卫生、化学、物理、动植物学、历史、地理、

簿记、圣经都用英语课本和英语讲授。甚至连每日的早操也都是用英语发口令,⁵⁶ 立求塑造学生具有“英国式”的绅士风度，英文水平颇高，而且教学严谨。倪柝声回忆三一书院特别注重英文的情况，学校主要学科全部用的是英文课本，并且特别注重英文写作及讲说。例如许多学科都是一、二年工夫学过就再学别的。但是英文写作及讲说却是从第一年至第八年一直学不断的。不止在年数上是如此的长，而在每周所占的时间也特别的多。比如数学每周只上二课，最多的课也不过每周上三课。但是英文讲说却每周上五课，连上八年。

⁵⁷ 不仅如此，汉英学校教学十分严谨，1918 年汉英一个班级 40 多人，但仅仅 3 人获得毕业文凭按时毕业；1921 年另一个 40 多人的班级有 6 人毕业，就被称是“建校以来最大一个毕业班”。⁵⁸ 汉英学校培养的学生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声誉，一部分直接免试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其他毕业生多受聘于薪水丰厚的邮政、海关、盐政、电报等部门（参图 1）。

图 1. 三一学校校长林步基向福建邮务长推荐汉英学校肄业学生



⁵⁶ 江中美：《我在三一学校读书时的几件事》，林金水主编《政协文史资料选编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462 页。

⁵⁷ 《源泉流》网络：少年倪柝声—《你所不知道的倪柝声》之四。

⁵⁸ 江中美：《我在三一学校读书时的几件事》，林金水主编《政协文史资料选编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462-463 页。

资料来源：福建省档案馆

汉英学校无论从教师配备、学费收取、都是首屈一指的，三一男校学费不过为 208 元，而汉英学校的学费达到 5000 元，小学教师为民国时期的中间阶层，1926 年北京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为 41.25 元，汉英学费相当于一个中等阶层教员 10 年的工资总收入，收费十分昂贵(参表三)。⁵⁹ 学费不仅足能支付教师的高额薪水，而且还有不少盈余。1919 年万拔文卸任三一书院首任校长时，学校为其在校园中央建立了一座“思万楼”，以表彰其办学卓著。⁶⁰

表三. 1918-1925 年汉英学校的收支对照表 单位：（元）

年度	学费	薪水
1918-1919	4882.20	2799.22
1919-1920	5306.78	3377.00
1920-1921	4932.50	4917.00
1921-1922	5832.50	3485.16
1922-1923	6188.50	3503.00
1923-1924	6888.00	
1924-1925	4553.89	4093.00

资料来源：刘玉苍：《早期的福州三一学校》，林金水编：《政协文史资料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437 页。

1921 年在三一学校的国民教育中，宗教课程仍旧占一定比重，但是其他课程的比重也在大大增加，总体上持平并逐渐超过宗教课程，开始和其他公立学校接近。可见圣公会办学逐渐从以传教为目的导向转向为社会提供精英教育。另一方面由於宗教性大为减弱，汉英学生的受洗比例大幅度降低，1921 年中学部仍有 75% 的受洗比例，然而汉英仅仅有 40.8%，提供精英教育的导向在较大程度上削弱了办学的宗教性。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差会，美部会，所办的格致中学转型得更加厉害，每个学期均有 2 个学分的党义课程必修课，

⁵⁹ 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 50-51 页。

⁶⁰ T.C.D. in China, p. 57

而宗教课程已经退出必修课，仅仅作为选修课了，反映出基督教学校的“宗教性”逐渐淡化而“教育性”却日益增强(参表四、五)。

表四. 1921 年中华圣公会辖境男女国民学校课程表

	神道学	唱歌	修身	历史	国文	地理	算学	格致	体操	女校 女红
第一学年	背说：主祷文、摩西十诫、诗篇第 23 篇，122 篇；马可福音 13:13-16 节；圣约翰 3 章 16 节；口演：旧约、新约各种故事	国歌、爱国歌、赞美诗四首	新法 1-2 册			天文、地文、人文	甲、何谓一至百数；乙、认读数位；丙、加减；		柔軟体操各种游戏	
第二学年	读说：以色列颂；背说：诗篇 24、103 篇；马太福音 5 章 11-12 节；约翰福音 10 章 7-18 节。口演：约瑟摩西与以色列人；主耶稣事例并使徒行传。	同上	新法 3-4 册			地理入门上下册、绘本教室图	甲、加减浅算心算；	最新格致教科书 1 册	同上	
第三学年	读说：赞主颂；背说：诗篇 19、103 篇；马太福音 16 章 5-8 节、7 章 7-12 节、24-29 节。口演：旧约撒母耳扫罗大卫事历；选读新约四福音及使徒行传。			简明历史 上册		简明地理 上册、口授本省地理、绘十八省地图		同上 2 册	同上	
第四学年	读说：为执政者祷文并感谢父；背说：使徒圣经；哥林多上 13 章全；诗篇 61 篇、97 篇。口演：选读旧约伊利亚，以利沙；新约圣马可福音。			同上 下册				蒙学卫生学	同上	

据 1921 年中华圣公会福建辖男女国民学校课程表整理。

表五. 格致中学高中部必修课时数表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上期	下期	上期	下期	上期	下期
党义		2	2	2	2	2	2
国语		5 (4)	5 (4)	5 (4)	5 (4)	5 (4)	5 (4)
数学	外国语	6 (5)	6 (5)	5 (4)	5 (4)	5 (4)	5 (4)
	代数	4	2				
	几何		2	4			
	三角				3		
	解析几何				1	4	
	物理	5 (4)	5 (4)				
	化学			5 (4)	5 (4)		
历史	本国历史	2	2	2			
	外国历史				2	2	2
地理	本国地理	1	1	1			
	外国地理				1	1	1
生物		5 (4)	5 (4)	1			
体育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军事训练					3 (1.5)	3 (1.5)	3 (1.5)
必修课总课时		33	33	30	30	25	21
必修课总学分		27	27	23.5	23.5	19.5	15.5
应休总学分数		29	29	28.5	28.5	25.5	25.5

资料来源：郑瑞荣编：《福州榕城格致书院——福州私立格致中学简史（1848—1952）》，2000年修订版，第73页。

倪文修夫妇有九个孩子，虽然是个大家庭，但因为夫妇均工作或作生意，家道还算富裕。1903年倪柝声出生后，由父母受洗入美以美会，1910年倪家搬回福州定居，其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但倪文修对子女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高度重视，延请多位前清举人为家庭的子女们进行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启蒙教育，倪柝声曾回忆说：“我最初几年所进的是私塾，先生们都是老学究”，⁶¹ 私塾的教育不仅奠定了倪柝声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同时也让后来的倪氏对基督教的本土化改造具备了先天的条件。另一方面，林和平坚持每周末孩子们随父母到教会做礼拜，接受主日学教育，习读圣经，经历信仰之熏陶。这些启蒙教育为倪柝声及其兄姊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和信仰基础。

⁶¹ 《源泉流》网络：少年倪柝声—《你所不知道的倪柝声》之四。

四、倪柝声神学：神圣启示的先见

1916 年，十三岁的倪柝声进入圣公会差会所办的福州三一书院。⁶² 据倪柝声个人及同学魏光禧等人见证，倪氏在三一书院学习成绩优异，倪氏自己亦说过：“我在校中是何等不得了的学生，同时也是了不得的学生。坏的方面，我是一个常犯规的学生；好的方面，神给我天生的聪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论文常是贴榜的。”⁶³ 三一书院还与上海圣约翰大学保持着紧密联系，上海圣约翰大学承认三一汉英毕业生的资格，可以免试直接升入圣约翰大学的三年级。作为优等生的倪柝声如果愿意，很有机会到圣约翰大学深造。⁶⁴ 不过，倪柝声尽管进入了教会学校，传教士们宣扬的基督教信仰并未进入其内心，他曾于个人见证中，提到他对牧师的印象并不好，⁶⁵ 其母亲林和平也自己见证说，她没得救之前也是有名无实的教友，热心社会事务，对属灵的事毫不关心。⁶⁶

在当时的福州，基督徒倪文修、林和平算是社会精英，更是在一些基督徒爱国志士的影响下参加“同盟会”，从事推翻腐朽没落的清朝统治、振兴中华的革命活动，表现出极强的民族革命精神。民国初期，父亲倪文修曾三次与三个外国人打官司，“当时这是很少有的都打胜了。他说中国人可以让，外国人绝不可让”。母亲林和平“有一次参加外国人宴席被无礼责备为‘西崽’，她就推席不顾而回。她说对外国人绝不能失中国人体统”⁶⁷。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倪柝声积极参与三一学院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被三一学院学生推举为学生会副代表，他召集学生在汉英学校演说厅聆听福州城内学生代表关于北京郭饮光参加游行请愿被军阀残杀的报告，随后更组织“救国十人团”，将每餐吃饭前学生唱的宗教谢饭歌改成《国耻歌》，油印传单到校外分发，号召民众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并组织学生纠察队去搜查日货并要求学校停课进行活动。⁶⁸ 倪柝声说：“我自信我

⁶² 笔者为撰写此文，两次前往爱尔兰三一学院作研究，以期找到过去的学校记录，可惜没有找到倪就读的史料记载。所以当时倪柝声就读的是到底是三一书院的汉英学校还是它的初中部，无法确诊，但推断他进三一书院后，于 1923 年，也就是 8 年之后毕业，其时间长度吻合汉英学院 8 年制的时间规定。另参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下卷，中华福音神学院，1983 年，第 309 页。

⁶³ 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第一篇，《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六册，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11 年二版，第 219-220 页。

⁶⁴ T.C.D. in China, p. 54

⁶⁵ 《往事的述说》，倪柝声文辑，第一辑，第十八册，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11 年二版，第 74 页。

⁶⁶ 林和平：《恩爱标本》，上海：真如出版社，第 7 页。

⁶⁷ 《源泉流》网络：少年倪柝声—《你所不知道的倪柝声》之四。

⁶⁸ 同上。

有高度的民族意识。我是学校中最反对（学校主理）来必翰⁶⁹ 及洋人最热烈的学生。”⁷⁰ 因带头组织三一学校的“五四”学生运动，倪柝声被学校当局作停学一年的处分。⁷¹

1920 年 2 月，十七岁的高中生倪柝声因目睹母亲参加余慈度女士在美以美会天安堂的布道大会，发生了彻底改变大为感动，第二天他也去了，竟在布道大会中得救。他的得救是双重的，一方面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一方面做主的仆人終生事奉祂。⁷² 他從“述祖”更名为“柝声”，英文名也从过去的亨利（Henry）改为 Watchman，即守望者的意思，要做时代的警戒和劝告者。⁷³ 倪柝声皈依基督后，大发热心，积极地向同学传福音，把许多同学的名字列在本子里，每天为他们祷告。因此他被人嘲笑为“传道先生”。但他不以为意，结果到毕业时，全班同学几乎全体归信。⁷⁴ 从组织纠察队去搜查日货、到被人谑称是传道先生，他的改变实在很大。

得救之后倪柝声就对别的事失去兴趣，开始勤读圣经，又因他虚心学习，服在从英国来的西教士和受恩女士(Margaret E. Barber)之下，受她造就与成全。和受恩教士原是圣公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后来她脱离圣公会成为凭信心的自由传道人。同他一起去接受和教士训练的青年人，起始有 66 人之多，因和教士在主里很深又极其严格，不久之后这些青年人大多都不再去见她了。1950 年在香港倪氏自己见证说，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留下的只有 4 人。⁷⁵ 倪氏认真寻求圣经中神的心意，又因他聪颖过人，借着汉英学院优异的英文训练之赐，通过和教士的引导，读遍西方基督教属灵书报，对教会历史也有丰富认识。⁷⁶ 逐渐的，他把圣经的真理一项一项恢复出来，每一项恢复都需要极大勇气，一方面忠诚持守圣经的话，另一方面又要承担来自当时深受西方差会影响的中国基督教会的压力。从恢复受浸、擘饼的真理开始，到脱离宗派⁷⁷ 以及后来坚持建立在地方上的教会而不是差会或宗派的教会，⁷⁸ 每一项在当时都造成极大震撼。⁷⁹

⁶⁹ W.P.W. Williams, 接续万拔文，是当时三一学校的校长，见 *T.C.D. in China*, p. 57。

⁷⁰ 《源泉流》网络: 少年倪柝声—《你所不知道的倪柝声》之四。

⁷¹ 同上。

⁷² 《倪柝声—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台北: 台湾福音书房，2011 年 12 版，第 6-7 页。

⁷³ 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下卷，中华福音神学院，1983 年版，第 307 页。

⁷⁴ 同上，第 312 页。

⁷⁵ 《倪柝声—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台北: 台湾福音书房，2011 年 12 版，第 13 页。

⁷⁶ 《倪柝声—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台北: 台湾福音书房，2011 年 12 版，第 20-23 页。

⁷⁷ 《往事的述说》，倪柝声文辑，第一辑，第十八册，台北: 台湾福音书房，2011 年二版，第 75-83 页。

⁷⁸ 《工作的再思》，倪柝声文辑，第二辑，第十册，台北: 台湾福音书房，2011 年二版，第 7-8 章。

⁷⁹ 见于力工(“漫谈倪柝声”，导向月刊 161 期，1999 年)和杨绍唐(《教会与工人》自序，香港:福音书舍，1973)。

年轻的倪柝声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如王载、王连俊等人，他们不仅仅在学校内传福音，还经常敲锣打鼓地到街上去布道、唱诗及散发福音单张等，也利用节假日到四围乡村去传福音，在一两年之内有许多人得救，带进福州的大复兴。⁸⁰ 根据倪柝声自己的论述，“在 1921 年 3 月里，主给我看见受浸的真理，叫我看公会所施的滴水礼并不合乎圣经。因为在那几个礼拜内，我读圣经，看见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圣经说祂来到约旦河，说祂从水里上来。我就想起公会里替人施洗的时候，用一小碗或者小盆盛水，是怎么上来的呢……幸亏我后来得救了，才有了一个大转机。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小时候的受洗是错误的，并且若是受洗，按着圣经是应当受浸的。”⁸¹

关于当时教会里擘饼的实行，梅恩英(Grace Y. May)曾这样描述三一学校的圣餐礼：“在一个大礼拜厅里，桌子上覆盖着白色的亚麻布。一位牧师站在桌子的北端，主持一个季度一次的圣餐礼，仪式开始后，使用的是年的《公祷书》，牧师带领大家忏悔。仪式末了为英国国王祷告……桌子上的饼和杯子里的酒（这些都是从英国进口的）也是中国人无法理解的。”⁸²

经过祷告、查考圣经、并有其他弟兄证实之后，倪柝声决定擘饼并非一年只有四次，擘饼也不是只有受了按立礼的人才能主领。1922 年起，尚未走出校门的倪柝声便与王载在王载家里开始了“擘饼”聚会。⁸³

至于脱离宗派，据倪柝声自己的陈述，他认真查考圣经中有没有宗派这个问题，又与母亲及和受恩教士讨论，后来由父亲代表全家人，写信退出他们当时所属的美以美会。⁸⁴ 从按圣经的教导受浸、到清楚圣经中主日聚会擘饼的原则、到脱离宗派，倪氏忠实地遵照圣经的话去行。因为他紧紧地守住这个原则，以致后来他所创办的《复兴报》和《基督徒报》都极有能力，尤其是 1900~1950 年代，中国有几次的大复兴，⁸⁵ 新得救的基督徒众

⁸⁰ 《往事的述说》，倪柝声文辑，第一辑，第十八册，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11 年二版，第 85-89 页。

⁸¹ 《往事的述说》，倪柝声文辑，第一辑，第十八册，台北：台湾福音书房，1997 二版，第 75 页。

⁸² May, Grace Y. *Breaking the Bread. the Missiological and Spiritual Force that Contribute to an Indigenous Chinese Ecclesiology*, Ph.D. Thesis, Boston University, 2000, p. 49.

⁸³ 《往事的述说》，倪柝声文辑，第一辑，第十八册，台北：台湾福音书房，1997 二版，第 78 页。

⁸⁴ 《往事的述说》，倪柝声文辑，第一辑，第十八册，台北：台湾福音书房，1997 二版，第 81-83 页。

⁸⁵ Bays, Daniel H. *Christianity in China 1900-1950: The History that Shaped the Present*, April 22, 2008. See <http://www.globalchinacenter.org/analysis/christianity-in-china/christianity-in-china-19001950-the-history-that-shaped-the-present.php>

多又十分饥渴，倪氏的书报在中国基督徒当中影响力极大。尤其是双月刊的《基督徒报》，一系列有关启示录一~三章的信息把宗派制度完全暴露，⁸⁶造成许多人纷纷离开宗派，也引起差会派来的西教士们的反对。⁸⁷

由于家里自小就和西教士及西方朋友来往，加上在三一学院受到完整的西式教育，在二〇年代朝代改换的中国，倪柝声并没有借着他教育背景的优势从商或走仕宦之途，成为基督徒之后的他，也没有一味倾洋向西方差会和西教士看齐。他承认得到许多西方属灵伟人的帮助，⁸⁸在讲述属灵生命经历时，他也时常提到和受恩或其他西教士作例子，⁸⁹可见他并不否认这些人。然而在对教会和基督教工作之事，因着他个人早期关于受浸、擘饼、宗派的经历，促使他勤奋研读圣经，要明白圣经中初期教会、工作、及工人的榜样，愿意付代价照着圣经的话去行。《工作的再思》(1938)⁹⁰一书清楚表达他对教会、工作、及工人的看法，仅引用两处文字略为说明。

关于差会及差会的工作：

圣经里所有布道的团体，都是设立地方的教会，从来没有设立他们团体的支会的。如果我们都是出去设立地方教会，就有完全合作的可能。设立 xx 差会是可以的，设立 xx 教会就不合乎圣经。……我们如果到一个地方设立教会，就要非常地方的，什么色彩都没有才可以。你来到大理，是建立在大理的教会；我来到大理，也是建立在大理的教会；五旬节会来到大理，也是建立在大理的教会；圣公会来到大理，也是建立在大理的教会，不管他们所属的差会是什么，但目的都是建立在大理的教会，这样宗派就无产生的可能了。（196–197 页）

關於工人及其工作：

保罗到了哥林多，他是从安提阿来的。他在哥林多传了福音，有人得了救，有一个信徒的团体出来了。保罗在哥林多所设立的团体是什么团体呢？是在哥林多的教会。

⁸⁶ 《倪柝声—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11 年 12 版，第 252–255 页。

⁸⁷ 见“通问汇刊(卷一)”里许多来信讨论，《倪柝声文辑》，第二辑，第五册，台北：台湾福音书房，1997 二版。

⁸⁸ 见《倪柝声文辑》，第一辑，第九册，第 33-39 页；第二辑，第十册，第 195 页，台北：台湾福音书房，1997 二版。

⁸⁹ 见《讲经记录(卷二)》，倪柝声文辑第一辑，第十八册，台北：台湾福音书房，1997 二版，第 168-170 页。

⁹⁰ 《工作的再思》，倪柝声文辑，第二辑，第十册，台北：台湾福音书房，1997 二版。

他不是在哥林多设立安提阿教会的支会。他这样作是对的。等一等，彼得也到了哥林多，也传了福音，也得了一班人。彼得能不能说，你保罗是从安提阿来的，我彼得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所以我要另立一个团体呢？或者要另立一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支会呢？不能。彼得只能说，保罗所建立的，是在哥林多的教会，所以我所得的人，也只能放在这个教会里。不只彼得是这样作，后来亚波罗来了，也是这样作。他们都是把人救来了，就放在地方教会里。这样，在哥林多就只有一个神的教会，没有什么分门别类的宗派了。（191页）

《工作的再思》对教会、工作、及工人的见解穿越时代、深刻精辟、使人信服，也说明了为何很多人称倪氏为中国本土神学运动的滥觞，难怪地方教会一开始就由福州发展到上海、南京、北京、山东青岛济南等各大城市，到 1952 年教会聚会所（地方教会）在中国已有 400 多处。⁹¹ 查时杰说“聚会所受西方教会的影响小，很具中国本土的色彩，并且是独立自主，自给，自传，自养的独立形态教会”，成为“二十世纪以来，在中国地区所成立，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国独立教会”。⁹² 唐日安（Ryan Dunch）观察 1920 年之后中国基督教会的走向，差会支持的教会因参与社会活动失败转为追求个人敬虔，新发展出来的本土基督教会则完全脱离社会参与；关于本土教会，他說：“最重要的例子之一，便是‘聚会处’（Local Assembly）（后称为地方教会）或‘小群’（Little Flock）运动，正是在福州产生的。它的出现正好说明了 1920 年之后中国基督教内部所发生的变化”。他描述倪所带领的聚会处运动，其特点是“反差会、反神职、反组织、坚持传统神学、拒绝承认宗派、拒绝与宗派联结。”⁹³ 在此需要加一句说明，在倪氏眼中，他所建立的地方教会，并不是一个宗派，乃是一个该地所有基督徒聚会的团体。

结语

基督教办学显然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基督教在华教育出发点是为了传教，并借着教育提升民众品质和培养具有专业素养的牧师群体。或许是因西方科学文化的本质，鼓

⁹¹ 《倪柝声——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11年12版，第310页。

⁹² 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下卷，中华福音神学院，1983年版，第306页。

⁹³ Dunch, Ryan.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2001, p. 195.

励人独立思考，而不仅是重复背诵，从他们的教育传教事业中竟然培养出一个与西方基督教迥然不同、倡导回到原典、中国人最大的本土教会运动。福州倪家三代人的经历反映出传教士教育的发展，也产生出与兴办教育初衷截然相反的结果。尽管这些中国人受教于基督教学校，却没有盲目接受西方宗教传统，而是回到圣经真理，并极力挣脱西方宗派，借助教会学校培养的知识素养，将神学融会贯通，创造出融入中国社会特色的本土神学。2016 年笔者在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找到一份文件，其中赫然记录：“1922 年前后，福州三一书院高年级学生宣传不同于圣公会的礼仪方法，受浸重新成为基督徒，与圣公会的点水礼完全不同，……他们组成一个基督徒小团体”云云。校方承认尽管采取这样一个“不同常规”的做法，中国人的“赤诚和热切”亦令人欣慰，他们对师长仍“保持友好和尊敬”。另一方面，在校方看来，这些人的做法明显有别于圣公会的传统，是一件相当“不幸”的事情，⁹⁴ 反映出西方基督教差会对倪柝声等第三代中国基督徒既钦佩、又失望、又无可奈何的感受。或許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先生（Christopher H. Smith）于 2009 年在国会记录里所说关于倪柝声的表扬，可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语。史密斯议员肯定倪柝声是中国基督教界的先驱，并提起美国最大的基督教杂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把倪柝声列入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位基督徒之一。⁹⁵

⁹⁴ T.C.D. in China, p. 60

⁹⁵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155, No. 117, 2009.

St. Mark's College

Foochow

Believeable P. 23 + 26

Sept 14th 1908 A.D.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D. U. F. H.

Dear Sir

In compliance with the enclosed resolution of the C.M.S. Fuzhou Sept. Conference, I am writing a few words. The English work spoken of in the resolution of March 1907 A.D. is the same as the St Marks Anglo-Chinese college referred to in Sept 1908 A.D. The work has developed rapidly & seems to have a very special opportunity at the present time in China. It is I think unanimously felt by the missionaries here both C.M.S & D.U.F.H. that if T.C.S could supply the men, it would open out to the D.U.F.H. a great field for reaching the upper classes in China. If Stanley could be left with me and one more man added the work could be carried on at least for two years, when probably a full staff of four men would be needed. Conference has omitted all mention of building in the second resolution, as there seems good hope that the Pan-Anglican grant may suffice for this. The supporting, # 1.2. paying all

附件一

万拔文在1908年9月14日的亲笔函（后有英文打字版），说明办学大有进展但是教员人手不足，恳请圣公会差会帮助。

107
St. Mark's College

Foochow

the Chinese masters & expenses, except the missionaries' salaries, and as the school increases, some of the latter expense could also be met. Last term I had to refuse about 100 students & this term I am again refusing numbers owing to lack of teachers & accommodation, while the school within the first year 1907-8 rose from nine to ninety students. I mention these facts only to give some idea of the opening & opportunity, and I cannot but think that an appeal based on such facts & for such a special field of work might not only call forth the extra men required, but also the money for their support.

I have no doubt that Bishop Price will have an opportunity of meeting the A.U.F.M. committee &c. I need I think not add more. Trusting that in this tall othermatters God's guidance may be constantly given.

Believe me

Yours very sincerely

H. J. Pakenham Walsh

*I forgot to add that St. Marks need
under the D.W.M. a teacher
as English, Latin and
Gymnastic.*

St Mark's College,

Foochow.

Sept. 14th, 1908, A.D.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D. U. F. M.

Dear Sir,

In compliance with the enclosed resolution of the C. M. S., Fuh-Kien Sept. Conference, I am writing a few words. The English work spoken of in the resolution of March 1907, A.D. is the same as the St Mark's Anglo-Chinese College referred to in Sept. 1908 A.D. The work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seems to have a very special opportunity at the present time in China. It is I think unanimously felt by the Missionaries here, both C. M. S. and D. U. F. M. that if T. C. D. could supply the men, it would open out to the D. U. F. M. a great field for reaching the upper classes in China. If Stanley could be left with me and one more man added the work could be carried on at least for two years, when probably a full staff of four men would be needed. Conference has omitted all mention of building in the second resolution, as there seems good hope that the Pan-Anglican grant may suffice for this. The school is already self-supporting, i. e. paying all the Chinese masters and expenses, except the missionaries' salaries, and as the school increases some of the latter expense could also be met. Last term I had to refuse about 100 Students, and this term I am again refusing numbers owing to lack of teachers and accommodation, while the school within the first year 1907-8 rose from nine to ninety students. I mention these facts only to give some idea of the opening and opportunity, and I cannot but think that an appeal based on such facts and for such a special field

of work might not only call forth the extra men required, but also the money for their support.

I have no doubt that Bishop Price will have an opportunity of meeting the D.U.F.M. Committee, and so I need, I think, not add more. Trusting that in this and all other matters God's guidance may be constantly given.

Believe me,

Yours very sincerely,

W. S. Pakenham Walsh.

I forgot to add that St Mark's would be under the D. U. F. M. in the same way as Fuhning.

Telegraphic Address "TESTIMONY, LONDON"
Telegraphic Code "VIA EASTER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Salisbury Square,
London, E.C.

22nd. December 1908.

Dear Sir,

Your important letter, on behalf of the Dublin University Fuh-kien Mission Committee, which we received on the 2nd. inst., has been carefully considered by our Committee.

we didn't know *private*
It is hardly necessary for me to assure you that our Committee heartily appreciate the readiness which the D.U.F.M. have expressed to assist in the educational work in Foochow, but the subject, on fuller consideration, appears to the Committee to involve the administration in considerable difficulties, and they regret that they cannot see their way to recommend the arrangement whereby D.U.F.M. would become responsible for taking charge of St. Mark's College, Foochow. They earnestly hope that the able band of Missionaries in Fuh-ning may see their way to consolidate the work in that District, and extend into the immediate regions beyond to the north and north-west.

Ever sincerely yours,

B. Barnes Gould

Sec. C.M.S.

The Rev. R.M. Gwynn,

40, Trinity College,
Dublin.

附件二

同年(1908)12月22日圣公会差会覆函，为无法支援人手深感歉意。

Courtesy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n Library
TCD MUN DUFEM-37-109-01

Telegraphic Address "TESTIMONY, LONDON"
Telegraphic Code "VIA EASTER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Salisbury Square
London E.C.

Dear Mr. Muller,

We have received extracts from the Minutes of the Pan-Anglican Fund Trustees, dealing with the Pan-Anglican grant of £6,000, viz. £5,000 towards a group of institutions comprising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High School, Normal Glass School, with Chapel, gymnasium, houses for two married Missionaries, accommodation for two unmarried Missionaries, and four Chinese masters, together with an additional grant of £300 towards a Normal School for women. We have also received the resolutions of the Building Committee of August 20th, offering £1,400 to the Society for the site and buildings known as the 'Divinity School compound', and also the resolutions of Conference of August 24 &c. recommending the acceptance of this offer. These documents have been accompanied by a very full and helpful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Committee by your Bishop.

The matter has been very carefully gone into by our Committee, and it is with much satisfaction that we have now to inform you that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of your Conference of August 24 &c. have been approved, viz. -

附件三

圣公会差会通知三一学院福建传道会，同意支助在福建省的工作五千英镑。（此信应该是写于1908年6月24日）。

Courtesy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n Library
TCD MUN DUFEM-37-145-0001

Telegraphic Address "TESTIMONY, LONDON"
Telegraphic Code "VIA EASTER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Salisbury Square
London, E.C.

2)

" (a) That the offer of the Pan-Anglican Fund Trustees of £1,400 for the present Divinity School Compound and buildings, be accepted.

" (b) That £550 out of the above purchase money be set aside for site and building of a Junior Boys' Boarding School in the vicinity of the Pan-Anglican Grant buildings.

" (c) That £100 out of the same be set aside for the erection of a new Mission Godown.

" (d) That £500 out of the same be reserved for the purchase and adaptation of a house in Foochow City as a residence for a Missionary.

" (e) That the remaining £250 be added to the Pan-Anglican grant for the Women's Normal School.

" (f) That the transfer of the present Divinity School and residence to the upper compound, be approved.

" (g) That, in view of the conditions required by the Pan-Anglican Grant Scheme, the D.U.F.M. be requested to include the Normal Class and High School, in addition to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mong the Institutions to be ' worked exclusively by ' D.U.F.M. Missionaries.'

" (h) The Committee place on record their thankfulness that such a complete and satisfactory readjustment of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Foochow has been rendered possible, in consequence of the grant from the Pan-Anglican Thankoffering Fund to the Fuh-Kien Diocese, and they trust that the scheme thus inaugurated may, under the Divine Blessing, conduce largely to the consolidation and extension of Missionary work throughout the Diocese."

Telegraphic Address "TESTIMONY, LONDON"
Telegraphic Code "VIA EASTER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Salisbury Square,
London, E.C.

3)

The Committee have noted that in the event of the D.U.F.M. becoming responsible for the Normal Class and High School, in addition to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Foochow, the Rev. J.Hind has definitely offered to rejoin the D.U&F.M. staff working in the Fuh-Kien Province, as a C.M.S. Missionary, and the Estimates Committee have been asked to make the necessary financial provision to meet this case, but Mr. Hind's offer is, of course, to come in the ordinary way before the Candidates Committee, and has not yet been dealt with.

We remain, dear Mr. Muller,

Yours very faithfully and affectionately,

Secs. C.M.S.

W. Muller, Esq.